

理论与方法,而这是某一专业门类的期刊无法容纳的。《文献》本来就是一个架设在具体文献载体之上的刊物,所以衷心期望贵刊能刊载这样的稿件,从而形成对整个文献学界的牵引力。

艺术史文献的“同”和“异”

谷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很荣幸受邀到国图参加《文献》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文献》是个老牌的学术期刊,创办至今已经40年了。予生也晚,虽然非常关注这份刊物,但大致算算,可能只看过近十年间所出的大部。我对《文献》的印象,或者说是我个人感受到《文献》杂志的两个特点,第一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干货”比较多。第二是新披露的材料比较多,比如一些新见的信札、稿本、题跋等等,以此为基础,对这些文献做相关研究,这样的文章比较多。这两个特点,恰恰说明《文献》是又古又新的,既关注古典,同时对于新材料也乐于接受和包纳,另外还可以感到,《文献》既有分量同时又很轻快,分量当然是就其学术含量而言,轻快是指那些篇幅不长的短论、札记,揭示新见材料的文章,大多能很快地发表出来。不过,特点往往既是优点,同时也可能是不足之处,以前我在看《文献》的时候,常会觉得很多论文缺乏深度的讨论,这个问题天然老师发言中也提到了,她的表述就是“貌似有朴素之形,本质却无定谏之实”,这是很多文献专业论文的状况,确实是关注到了一些问题,但问题背后还有什么?当时的历史状况和样貌如何?没有通过深度探索重建和恢复起来。

如何办出《文献》的特色,这应该是编者和作者一同思考的问题,刚才几位老师谈了关于他们研究领域的问题和诉求,我也想咨询,《文献》是否可以开放些空间给艺术史研究方面的文章?虽然很多论文的专业归属是艺术史,但是围绕书画文献或金石文献等展开讨论的,也都是“干货”。今天来的时候我看到国图正在举办“中国古代书籍插图展”,很感兴趣,还没来得及看。关于古籍版画、插图以及版刻书法的研究文章,《文献》是不是也可以发表一些,甚至可以组织专题讨论?

很长时间以来,我对明末清初一位僧人石濂大汕比较关注,国图就藏有他的《离六堂集》,这部书在乾隆年间是被禁毁的,相当稀见。《离六堂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有三十多幅版画,是大汕的自画像,其中一幅还有刻工的署名:“吴趋弟子朱圭上如敬镌”。郑振铎先生把这些图称为“石濂和尚行迹

图”，收在《中国版画史图录》里，最近我得到已故汉学家芮效卫(David Tod Roy)的一本藏书，是吴百益(pei-yi Wu)所著的*The Confucian's Progres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a*(《儒者的进阶：传统中国的自传作品》)，1990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书的封面就是大汕“行迹图”中的《遇异图》。大汕很喜欢画自画像，据我的观察，大汕可能是明清时期画自画像最多的人，存世墨本也有好几件，将一位画家手绘的作品和版刻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大汕的这几十幅“行迹图”讲述了很多故事，从各个方面树立自己的形象，前辈学者饶宗颐、王伯敏、姜伯勤先生和台湾的毛文芳教授都有关注或研究。但是，大汕的这一批画作为艺术史文献，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它其实对早些时候的绘画和版画是有借鉴的，比如陈洪绶的《隐居十六观》、晚明人物画谱《天形道貌》等，对其主题的选择都有影响。至于陈洪绶的版画，特别是《博古叶子》中的几幅画，甚至被“行迹图”完全照抄了，我们两边各取几幅对比一下，立刻一目了然，不证自明。这些文献让我们认识到明清时期一些版画的流行程度，还有不同艺术形式和文化阶层的深刻互动。

“行迹图”留下版画刻工的名字，同样值得注意。朱圭算是比较有名的巧工，他刻过金古良的《无双谱》，流传很广。大汕的“行迹图”，朱圭是否深度参与画稿的创作？他们有着怎么样的一种合作？这一套图多大程度上体现出朱圭的理念和风格？这都是还没完全弄清楚的问题。相比一些无名的画工和刻工，朱圭已是很出色和幸运的了，董捷先生在《版画及其创造者》中就谈过“‘影子’画师”的问题，很多版画的画师，仅仅因为身份低微就被剥夺了署名权，刻工也常常如此。大汕本人早年就给大画家沈颢和龚鼎孳做过“画童”，沈颢和陈洪绶是朋友，《隐居十六观》就是陈送给沈的，有他的上款，那么大汕当“画童”时有没有代过笔，代过哪些笔，还不太清楚。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也举例提及，作为金农弟子和长期代笔者的罗聘，他创作《鬼趣图》和对鬼怪题材抱有浓厚兴趣的原因，不妨理解为“早期如同影子般存在而不被承认的代笔经历”。说到《鬼趣图》，也是很有意思，它还被认为借鉴了一些西方医学文献中的图像，比利时学者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就发现，《鬼趣图》第八图的骷髅画像，挪用了维萨留斯《人体组织》和昂布鲁瓦兹·帕雷《解剖学》中的骨骼图像，这两本书出版于16世纪的欧洲，有很多种译本，中译本《人身图说》在17世纪就已经流行了，而罗聘画《鬼趣图》虽然不止一本，但大概都在18世纪的后三十年，时间也能对得上。梳理艺术史文献，有时候需要做很多类似“查重”的工作，这样才能发现渊源、找出联系，但这个工作虽然简单却不容易，目前来看只能靠看得多和记得住，没有见过就是没有见过，难免会把借鉴甚至抄袭当成原创。

与古籍相关的艺术文献不止版画,还有版刻书法,相关问题的研究论文《文献》似乎未见发表,我们只能在书法类的刊物上面见到。大汕的“行迹图”每幅图都有题赞,像册页的对题一样,作者各不相同,而字都是手书上板,行楷草隶,甚至还有小篆和古文,比如屈大均题的《供母图》就用隶书,屈的行草书我们还看过,隶书只有肇庆七星岩的小千尺壑题刻,墨迹目前一件也没有看到,至少我没有印象,如果《供母图》题赞确系摹刻屈大均手迹的话,那珍贵程度自然不言而喻。刚才提到画谱《天形道貌》对大汕的影响,它的编者周履靖在刻另一部人物画谱《绘林》时遍邀名士题识,将他们的手书刻出,这个做法很可能启发了大汕。至于周本人的书法,好像也没有看见流传,但是最近我看到一本卓君庸题赠给林宰平的木刻小册子,内容是周履靖写的全本骆宾王《与程将军书》,字体是章草,写得很好,有落款和印章。卓和林都是特别喜欢章草而且在当时大力推动章草研究和知识普及的人,这个小册子很薄,并非字帖,很明显是书籍,但不知道是从哪里抽出来的,还是有着什么其他的情况?但至少让我们看到周履靖书法的一个样貌,而它也得到晚清章草研究者的认可。

书法进入书籍,两者产生联系,时间是很早的。去年在北大文研院参与过一次有关“制造《陶渊明集》‘苏写本’”的讨论,这个话题涉及书籍史、书法史、文学史等不同领域,但研究的基本对象还是文献。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它的成立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苏轼书写过大量的陶渊明诗文,二是苏体书法成为一种书籍版刻字体——两方面都需要文献支持。那天报告人蔡丹君老师主要谈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的文献也需要多加关注。从现存一些宋版书籍来分析,确实能够看到苏字的流行和东坡体书法进入版刻领域的现象,比如两宋之间一部相当重要的禅宗典籍《宗门统要集》,它的南宋刻本有淳熙六年孝宗次子赵恺的一份题跋,这份题跋是以手书体上板刻成的,字体就是苏字,另外嘉熙三年所刻《新编四六必用方輿胜览》,书前有吕午序,苏字特点也相当明显。但是,赵恺和吕午的传世墨迹我们没有见过,因此也不好判定是否就是根据他们手书刻成的,这里有三种可能:一是确是赵恺和吕午撰并书,而赵和吕二人的书法都学苏,这样的话,就为我们保存下了一份有关赵恺和吕午书法的文献资料;第二种可能是序跋作者完成文字之后,刻书者请善书者代笔誊写,再令工匠刻成,而当时书写的人正是一位学苏字的书法家;至于第三种可能,就是书的编者特意集苏轼的墨迹然后刻成。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这部《新编四六必用方輿胜览》,比国内藏的几种版本要早,是宋理宗嘉熙己亥年的初刻本,就是1239年,这时候编者祝穆和吕午都在世,而祝穆其实对苏轼是非常了解和熟悉的,我们看《方輿胜览》里有很多关于苏轼的记述和考证,他如果确实是一个“苏粉”,是完全有可能有动力去

集字来刻的,或者把集出的字摹写之后刻出来,这时候呈现出来的字虽然稍失神采,但还是能看出苏字特点。还有另一本南宋淳熙年间刻的《啸堂集古录》,前面有李邕的序文,也是手书体,虽然不及前两本书中字体肥扁更接近苏体,但也可以看出明显是由苏字而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看到苏字在南宋时候已经成为刻书时选用的一种字体,从法帖到图书,书法和书籍真正发生了关系。

从文献来看,苏字不光在南宋进入书籍领域,而且早在北宋就有苏体书法的刻经了。现藏日本京都东福寺的《楞伽经》,是元祐三年,也就是1088年所刻,字都是很明显的苏体,而且序文有署款,题跋也以苏轼自己的口吻说这是他写于元丰八年的,还记录了本事。祁小春老师在《古籍版刻书迹例说》里也提到,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书法写刻本,相当重要,而且内容丰富,有四万多字。经的最后还有等觉禅院僧人的跋,也是用苏字写成的,也许是后请苏轼写成,也许是摹写或者集字,都有可能——但看这部分字中相同的字,字形稍有不同,假如是后两种情况的话,那可以说摹写或集字非常用心。这件《楞伽经》,其实既是一件具有图书性质的经卷,也是一件具有艺术品性质的法帖,它是一个交汇点,而且时间很早,值得留意。另外,台北故宫还有一部宋刊苏写本《妙法莲华经》,七卷七册,2006年曾在“大观:宋版图书特展”中展出,苏轼于熙宁二年(1069)写《妙法莲华经》,是史有所载的,但不知道台北故宫这部刊本具体何时刻成。由此联想到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苏轼书法之所以不仅在文化精英阶层享有盛誉,而且为普通民众所熟知和喜爱,与当时不少佛经是由苏体刊刻而成大有关系。

实际上,某体书法的墨迹本和刻本,区别有时候还真不小,这与刻工对书法的理解体会有关,也与刻工工作的态度有关。将书法墨迹镌刻出来,无疑会或多或少地失真,至于根据初刻本翻刻或以某本为底本摹刻,最后成书的字体,难免失去更多重要原始信息。比如前面提到的宫内厅藏本《新编四六必用方輿胜览》,是编者还在世时候的1239年刻成的,国图藏本《新编方輿胜览》,是咸淳三年也就是1267年刻的,吕序的字体与初刻本已有小异,至于台湾“央图”藏的南宋本《新编方輿胜览》吕序书体,虽然苏字的风格特点基本存在,但书法的意味或者叫做书写感就很少了,显然这一本要晚于前二者。注意到这些文献的“同”中之“异”,我想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就我比较关心的艺术史文献方面的问题,结合对《文献》的感受和期待拉杂言之,不妥之处尚望见谅和指教!